

康 德

作者：Roger Scruton

譯者：蔡英文



西方思想家譯叢⁽¹⁶⁾

康德
Kant

Roger Scruton 著 • 蔡英文 譯

康德 西方思想家譯叢⑯

73.3.0652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著者 Roger Scruton
譯者 蔡英文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7號
電話：7681234 — 2317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 11012-16 •

康德

史克魯坦(Scruton, Roger)撰 蔡英文譯 民國73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3]136面 21公分

原書名：Kant

(西方思想家譯叢¹⁶)

附：康德專門哲學術語譯註、徵引書目、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I. 史克魯坦撰 II. 蔡英文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784.386

665

8856

NT\$100.00

序

我嘗試以現代的語彙來表達康德的思想，同時，也以呈現出最起碼可能的哲學知識作為先決的條件。康德是近代最複雜難懂的哲學家之一。因此，我並不敢奢望自己已經把這思想的各個方面清晰、明白、易解地呈現在一般讀者的面前。他思想的任何層面是否曾經為任何一個人，甚至是康德本人所瞭解，實難確定。康德的哲學是如此的深奧、複雜，除非完全沉潛於其中，否則是無法理解它的問題的重要性，以及領略到他解決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想像力。康德希望找出人類知性的限度，然而發現自己被迫去超越這些限度。因此，如果讀者為了領略康德的整體觀點而必須再三閱讀這本導論性之作，他不應該感到意外。去體會康德的整體觀點，即是看出這個世界有所改變；要有這樣的體會並非祇靠一天的努力就可達成。

這本書的初稿寫成於布拉格。我特別感謝海達涅克 (Ladislav Hejdánek) 博士，不祇是因為他邀請我在他的關於「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這個主題的討論課中發言，而且，對於他能身體力行而立下道德的典範，深為感佩。彌格 (Ruby Meager)、布雷特 (Mark Platts) 與艾珍頓 (Dorothy Eddington) 評論我後期的草稿，使我獲益良多。從倫敦大學的學生那兒，我也得到不少的助益，過

去十年來，我教導他們康德哲學，教學相長，收穫豐碩。德美勒克娃 (Lenka Dvoráková) 的體貼襄助給予我的幫忙，非筆墨難以表達，這本書是題獻給她的。

史克魯坦 (Roger Scruton)

一九八一年五月，倫敦

目錄

序.....	I
第一章 生活、工作與個性.....	1
第二章 康德思想的背景.....	13
第三章 超越的演繹.....	27
第四章 假象的邏輯.....	51
第五章 無上命令.....	73
第六章 美感與設計.....	99
第七章 超越的哲學.....	117
康德專門哲學術語譯註.....	121
徵引書目.....	125
推薦書目.....	127
人名註釋及索引.....	129

第一章 生活、工作與個性

這位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一生當中，引導他行動的，不是別的，祇是責任。就這樣，他的生活就乏趣可陳。對他而言，一位德行美好的人正是能主宰自己的情慾、不為情慾左右的人，他視權力與名譽如糞土，認為它們與責任本身的價值相較，不值一提。他替自己的生活劃下了這樣的範圍，因而能够毫無約束地依照他的理想而行動，他於是獻身學術，完全過著一種很規律、自得其樂的生活。這位矮小的科尼斯堡（Königsberg）的哲學教授遂變成近代哲學家的典範：身限於狹隘的居處，但自認為是位無限大空間中的君王。

依曼紐·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年生於科尼斯堡。他的父親是一位窮困的馬具製造匠，共有九位子女，康德居第四。康德的父母性情單純，是虔敬的「虔信派」信徒。在當時，「虔信派」（Pietism）是路德教會宗教改革運動中的一個教派，在德國的下層與中層階級中，具有廣大與深刻的力量，它以工作神聖、責任與祈禱的觀念來慰藉這些生活於艱困中的人民。同時，這個教派認為良心是引導人行為的最高權威，這種思想深刻地、持久地影響了康德的道德思想。這個教派儘管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反知」（anti-intellectual）的傾向，卻是促成十七世紀末期德國教育普及的主要力量之一，「虔信派」就曾於科尼斯堡設立過

一所學校。康德八歲時就進入這所學校求學，他的天分早已為一位聰慧、仁慈的牧師所贊揚。康德家卑微窮困，像這樣的家庭能有一位子弟接受如是的教育，算是一件頂幸運的事。然而，對年輕的康德本人而言，這或許並不是很幸運的。他對學校的教師是尊重混合著反感，反感他們熱衷於壓逼學生，因此他日後經常克制自己，不願提及早年的教育過程。從康德晚年演講筆記中所編纂出的、討論教育的短論中，可以找出他求學時的印象：

許多人在回憶童年時，都會感覺到這是一段最快樂最美好的時光；然而，事實却不是這樣。這是最艱辛困難的時期，因為我們生活在最嚴苛的紀律底下，很少能夠選擇自己的朋友，而且，更沒有個人的自由。

康德求學時期的一位朋友，後來成為語言學家的大衛·魯恒肯（David Ruhnken），在他們倆都成名後，曾經寫一封信給康德，其中，他如此說道：「我們倆個曾經在那些狂熱分子迂腐而陰鬱的但也並非完全無價值的訓練下呻吟受苦，現在三十年已過去了。」無可否認，康德本人深沉的憂鬱感，以及超凡的自律都是孕育於這一段求學的時期。他成年初期，有一部份的時間，是努力以自律來克服憂鬱感。關於這方面，他幾乎是成就非凡。儘管他環境惡劣、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而且他所尊敬的父親及摯愛的母親雙雙去世，但康德很快就成為科尼斯堡最受歡迎的市民之一，人人都欣賞他優雅的氣質、幽默機智以及健談。

康德十六歲時進入當地的一所大學，六年後畢業。由於無法獲得學院的教職，祇有奔走於各類家庭中，當一名家庭教師。一直到三十一歲時，他纔獲得大學的教席，但不領薪俸，祇能以私人教師的身份公開講課，從學生私人所繳的學費中，獲得微薄的收入。在這個時期之前，康德已出版有關

動力學與數學的著作。同時，透過他本人因家庭教師的地位而建立起來的關係，康德也獲得一份社會的安逸感，使他贏得 *der Schöne Magister*（鴻儒）的頭銜。

當時，科尼斯堡有五萬人口，有一重要的要塞，是一個被認為是有幾分重要的城市；也是一個港口，為東普魯士的重要貿易轉運港，容有喧譁繁忙、來自各地的人口，包括荷蘭人、英國人、波蘭人與俄羅斯人。它有一所大學，創立於一五四四年，是為 *Collegium Albertinum*（愛爾博特學院），也是一個蠻重要的文化中心，儘管在十八世紀中葉，它已變得默默無聞，因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於一七三九年，以一位儲君的身份訪問這個城市時，把它描述為「是比較適合訓練出大熊（譯按，指粗魯之人），較不適合成為一座科學的劇院」。次年，佛德烈登基為普魯士君王，在位期間，他盡己之力，把高度精緻的文化與知識寬容的精神撒播在王土的每一個角落，而使高度的文化與知識的寬容成為他統治時期的特徵。此時，康德已經決心把真理與責任視為最高的價值，因而很幸運地發現他任職的大學並不太阻撓他對兩者的追求。或許由於這樣的的因素，或許也由於他深愛其鄉土，促使他為獲得第一分大學教職，而等待一段長久的時間，並且再為取得他期望得到的正教授之職，又繼續等待了十五年。在這一段期間內，康德屢次回絕德國其他各地大學的聘請，立意在他租賃的屋子裏繼續講學，這些演講而後建立了他的聲名。他的思想工作主要是專注於數學與物理學，三十一歲時，他出版了一篇討論宇宙起源的論文，其中包含着最早建構星雲說(nebular hypothesis)。但他的職務是要求他講論範圍寬廣的科目，包括自然地理學，或許由於他性喜旅行，因此使他成為這門知識的權威，也使他變成，據普格斯陀(Purgstall一位相當崇拜康德的公爵)

的看法，一位健談者。

康德的教職能讓他擔任形上學與邏輯，有時候則是數學或自然科學的課程，這也是有幾分偶然、幸運的事。然而，從他生涯這一時期開始；他就全力於哲學的探究，在他的講學裏，預備了日後所要出版的著作的思想，十年以後，這本著作出版，奠定了他的聲名——德國最偉大的導師。據一位哲學家哈曼 (J. G. Hamann) 的記載，要聽康德講課的人必須在清晨六點時，就到教室，以免向隅；這位哲學家於七點鐘時走進教堂，開始他的講課；他的一位學生傑赫曼 (Jachmann) 如此描繪講課的情形：

康德以特別靈巧的方法來強調與界定形上學的概念，這個方法在於，很明顯的，面對聽眾進行他探索的過程；講課時，康德宛如是剛開始考慮問題，然後，逐漸增加新的決定性的概念，而且逐步地修正與發展以往確立的解釋觀點，最後，獲致他研究之主題的確定結論，而這結論是他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反覆思索得來的，就如此，他帶給那些專心聽講的學生，不祇是有關這門學科的知識，也是有關方法之思想的實例……。

這位學生在給友人的一封信函裏，也如此描繪康德講論「倫理學」時的情形：

在講論倫理學時，他就不再祇是一位講求思辨的哲學家了，也變成一位精神振奮的演說家，隨著他的演講，他全然攫住聽眾的心靈與情感，以及滿足他們的知能。能聽到一位哲學家以哲學雄辯的言詞娓娓道出他所建構的崇高純淨的倫理學學理，這真是一件無窮妙趣的事。他的言論多麼動人，常讓我們噙然淚下，他的言論是多麼深刻，常激越我們心靈的底層！他的言論又是多麼崇高偉大，常使我們的心智與情感得以超越卑俗的自私自

利，而臻乎自覺到純粹自由意志，以及絕對服從理性法則與感知對他人有責任的崇高境界！

傑赫曼的這種描述並不能說是錯誤的，祇是有些言過其實，但，畢竟，在康德尚未出版偉大的著作之前，他已經因為演講——包括公開與私下的——而廣為人所認知。

康德的私生活常常被人嘲諷，說是像時鐘一樣的刻板，是一絲不苟、喜愛賣弄學識而且自我中心。據說（海涅的說法）科尼斯堡的家庭主婦在康德散步而經過她們的門口時，調整時間；據說（康德本人曾這樣說過）康德患有憂鬱症，因他時時刻刻關心自己的身體境況；又有人說，康德的住家與家中的傢俱非常簡陋，顯示他毫無美感，也說，他生活的守時與一絲不苟祇是掩蓋住他那冰冷、僵硬的心。

的確，康德的生活如果不是像一部機器般刻板的話，那麼，至少是相當嚴謹的自律。他規定男僕每天清晨五點時喚醒他起床，而且不管他如何賴床，都必須叫醒他。而後，在書桌伏案工作到七點，當然是穿著睡帽與睡袍的；上完早課之後，回到家即立刻換上這服裝，繼續讀書寫作直到下午一點，用了他一天僅有的一餐之後，不管晴雨，到戶外散步。他散步總是單獨一個人的，這是因為他持着頗怪異的想法，認為交談會讓人張口呼吸，是故不適合在戶外交談。他不慣於喧譁吵雜的環境，曾經有兩次決意搬家，以躲避居民的喧囂；有一次，他甚至很氣憤地寫了一封信給當地的警察局局長，命令他禁止鄰近監獄的囚犯為求自我安慰而吟唱聖詩。除了軍樂之外，他厭惡任何形式的音樂，正如他不能欣賞所有的視覺藝術一樣。他的書房只掛有一幅從他朋友那兒得來的盧梭的版畫像，這是眾人皆知的軼事。

康德也理解知識份子就自身引發起來的苛責與控訴。為了自我辯解，他訴求於這張版畫裏的人物（盧梭），而說：

如果沒有盧梭的教導使他相信知識份子可以扮演恢復人類權利的角色，那麼，他會認為自己比一位勞動工人更沒有價值。就像一切以心智過生活的人一樣，康德需要一套自己加諸於其身的紀律。這套刻板的紀律不但沒有扭曲他的道德本性，反而，使他能過着一種適合他天份的生活，最後讓他的天份得以開花結果。他喜歡孤獨，也同樣喜愛人羣，而能够有所平衡。在他每天用中餐時，常常會招待各種不同的客人，而且，為了不使客人因必須拒絕他人的邀請而感困窘，康德總是在當天早上邀請他們；用餐時，康德招待他們飲用一品脫的紅葡萄酒，可能的話，招待他們一份精美的餐點。用餐後，他與客人，因他們的喜好與指示而談天，直到下午三點，賓主盡歡而散（康德的這種活動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也來自於他的信念，他認為歡笑有助於消化）。康德的著作裏包含着靈光一閃的諷刺警語，事實上，他相當喜歡閱讀諷刺作品。他對視覺藝術與音樂冷漠，但他卻愛好詩；甚至他關注自己的健康不過是他的「責任哲學」帶來的結果。他不羨慕靜態的生活，也從這種生活得不到快樂；然而，認為這種生活對於研究知識是不可缺少的。赫德 (Herder)，浪漫時代最偉大的、深具情感的作家之一，上過康德的課，而後在思想上極力抗拒康德的影響。但他仍很推崇康德本人，他如此簡要說明康德的性格：

我很幸運能夠認識這樣的一位哲學家，這樣的一位老師。儘管在壯年時期，他尚保有年輕人歡愉高昂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到晚年，他還會繼續保持這種精神的。他寬闊的額頭是為思考而設的，也是永恒的清朗明淨與歡樂喜悅的中心。豐富的觀念不斷地從他口中詭詭道出，嘲諷、慧黠與善意的幽默受他任意地發揮，他那益人神智的演講也同時是最吸引人的娛樂。

他以檢驗萊布尼茲、沃爾夫(Wolff)、鮑嘉登(Baumgarten)、克魯修奧(Crusius)與休謨的哲學，以及分析物理學家刻卜勒、牛頓所揭露的自然律的同樣的精神，禮讚盧梭新近出版的著作：〔愛彌兒〕(*Emile*)與〔愛露薏〕(*Héloïse*)，如同他禮讚他所注意到的在自然科學中的每一項新發現一樣，他評價他們的價值，而且，最後總是，回歸到一種客觀的自然知識與人道德價值的知識之上。

人類的歷史、民族與自然的歷史，以及自然科學、數學與他個人的經驗就好似滾滾不斷的源泉，使他的演講、每日的生活躍然有活力。他從不漠視任何值得注意之事。沒有任何的陰謀、黨派利益、權謀與名利慾望足以產生一絲一毫的力量而遮蔽與阻撓他對真理的推廣闡揚。他鼓勵而且溫和地逼迫人去獨立思考，專斷不是他個性中所有的。這個人却是伊曼紐·康德，每當我提起這個名字，內心深處總是充滿着感激與尊敬，一回想起他的形象，總是帶給我快樂。

康德在大學裏的教職需要他講授哲學的所有學科，有許多年，他把大部份的心智專注於講課，以及出版簡短、未圓熟的著作與論文。他最偉大的成就，也是第一本主要的出版作品：〔純粹理性批判〕，出版於一七八一年，這一年，康德五十七歲。對於這一本著作，康德曾寫信給孟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儘管這本著作是我十二年來不斷思索所得的成果，然而，我是在倉猝匆忙間完成它的，大概只花費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因此，只全心關注於它的內容，而較不注意於它的文字風格與可解性」(〔哲學書信〕，頁105—106)。為了減輕〔純粹理性批判〕閱讀上的困難，他又出版了簡短的〔未來形上學導論——為使形上學能被聲

言是爲科學的著作】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 which shall lay Claim to being a Science*, 1783)，在這本書當中，聰慧的哲學議論混合着他從〔純粹理性批判〕最引人攻擊的篇章中節錄出來的、不甚清晰的摘要。一七八七年，〔純粹理性批判〕再版時，康德重寫這些章節；結果，困難難懂的還是照樣難懂，因此，評論者遂承認：康德著作的晦澀難懂與其說是來自他文字的風格，不如說是來自他的思想本身。然而，不論這本著作如何晦澀難懂，在很短的時間內，它就變得非常有名氣，「批判哲學」在整個德語的世界裏，爲人津津樂道，而且爲人所講授、或抨擊反對，甚至遭查禁、迫害。康德的自信心逐漸增強了；一七八七年，他寫信給 K. L. 雷恩霍德 (K. L. Rheinhold，他對康德思想的普遍流行，貢獻良多)：「我可以確定地告訴你，在我個人的途徑上，走得愈長久，憂慮任何的矛盾衝突……會大大損毀我的體系，就愈減輕」 ([哲學書信]，頁 127)。

〔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後三十年，史達爾夫人 (Mme de Staël) 這樣寫着：「當發現到這本著作是包含着那麼豐富的思想寶藏時，它引起德國極大的震撼，從此以後，幾乎所有出版的哲學與文學作品都是因這本著作所給予的動力而完成的」，這句話很公正地說明了〔純粹理性批判〕的巨大影響力。

在康德寫給孟德爾松的書信中所提到的漫長的十二年的思索期間，康德幾乎沒有出版任何作品，同時，他早期（「前一批判」時期）的作品，對於研究他成熟完成的哲學著作的學生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也引發不起他們的興趣。然而康德一旦圓熟地表達了他的批判哲學，他就懷着日益增強的自信心，繼續探索這個哲學的枝節。〔純粹理性批判〕以系統方式處理形上學與知識論；日後，他出版的〔實踐理性

批判]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1788)，是關注倫理學的課題，而〔判斷力的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 1790) 則大部份是關注美學的課題。許多其他作品相繼出版，在集結康德所有著作所謂的 *Berliner Ausgabe* 中，現在共有二十七冊之多。就其他著作而論，有兩本作品是特別值得讓我們注意的：一本是已經提到過的〔未來形上學導論〕，另一本則是〔道德形上學探本〕(*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這兩本著作在一七八五年〔實踐理性批判〕未問世之前已經出版，也強有力表達了康德的道德理論。

腓特烈大帝執政期間，科尼斯堡呼吸了啟蒙的空氣，而康德也分享了腓特烈大帝手下大臣對他的敬仰，特別是當時的教育部大臣，傑德理茲 (von Zedlitz)，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是題獻給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 (Frederick William II) 繼腓特烈大帝而為普魯士君王時，情勢就有很大的改變。他手下的一位大臣窩爾諾 (Woellner) 具有很大的權力與影響力，在一七八八年開始負起宗教管理的責任，他企圖取銷宗教上的寬容的政策。一七九三年，康德出版了〔在理性範圍內的宗教信仰〕(*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這本著作是由科尼斯堡大學的哲學系出版的，因此，躲過了官方的查禁。儘管如此，窩爾諾內心十分不快，他以皇帝之名寫了一封信給康德，命令康德必須為自己提出辯護。康德以嚴肅的態度答應他的政府：不公開（無論是透過演講或是著作）討論宗教的問題。康德認為自己因皇帝的死亡而解除了這個誓約。然而，跟當政權威發生這樣的衝突，康德內心覺得頗苦惱與痛苦。康德以身為忠貞子民而自豪，雖然曾經有一次，在某種場合裏，他對一位英國人當面表示同情共和政體，語氣相當爽朗，差一點引起

一場決鬥，但由於康德的雄辯，而制止了這位英國人提出來的挑戰與意見（這位英國人葛林 Joseph Green 是科尼斯堡的商人，後來成為康德的親密好友）。

康德喜歡女人陪伴（只要她們不假裝理解〔純粹理性批判〕），有兩次甚至想到結婚。但每一次都猶疑不決而誤失良機。有一天，家裏的那位聲名狼藉且酗酒的男僕穿了一件黃色大衣出現在餐桌旁，康德一看，很憤怒的命令他脫掉並且賣掉這件大衣，也答應對財物的損失有所補償。後來，康德很驚異地發現到這位僕人曾經結過婚。但妻子去世，而現在又要再婚，這件黃色大衣是為再婚而買來穿的。這樣的發現，讓康德甚為驚駭，也從此不再看重這位僕人。看來，他實在無法說服自己接受正常的一般人的婚姻生活，對於婚姻生活，他有這樣的看法，他認為婚姻即是男女同意「交互使用對方的性器官」（〔哲學書信〕，頁 235）。然而在他早年的一本名叫〔美與崇高情感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Sentiment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 1764*）的著作中，康德以雄辯之文詞論說兩性的區別。他根本不認為男女稟具相同的本性，而此本性自身足以決定他們相互關係的特性；相反地，他認為女子在本性上是可愛的、美麗的、有溶化人之心的能力，對於「崇偉的」、講求「原則」與「實際」的男子而言，這些本性是極為陌生的。這樣地描繪女子頗符合康德對自然之美的描述。能激動他心靈的畢竟是自然，而且，他的母親從他孩童之時，所帶他去觀賞的，也就是這種自然之美的景色，因此，啟發他對於母親所喜愛的事物能有熱炙的情感。從康德對女性之可愛與自然之美的召喚，可以理解到這是愛慾之情的殘留物，如果康德曾更積極主動地表現這愛慾之情，那麼，可能會打斷他刻板規律的生活，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的思想史也無由從康德那兒得